

医线故事·连线援外医生⑤

利用国庆假期，上海援疆医生陈守真深入县城巡回义诊

在最西部边陲城市护航妇女儿童健康路

■本报记者 李晨璇

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在休整了几日后，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正在援疆担任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产科主任的陈守真又要出发了。

就在今天，他所在的上海援疆医疗队将奔赴距离喀什五六百公里之外的和田县、莎车县，开展为期4天的巡回义诊。

提到喀什二院，许多上海医生不陌生。十多年来，依托上海30余家三级医院“组团式”援疆，一批又一批上海医生奔赴这座位于中国最西部的边陲城市，开展医疗帮扶工作。身为上海市第十一批援疆医疗队的一员，已经在喀什二院度过6个月的陈守真带领当地医生开展妇科恶性肿瘤的诊治工作，对良性疾病进行微创治疗，并成功完成了单孔腹腔镜下复杂子宫切除术和子宫内腺癌分期手术等高难度手术。“填补空白技术，精进已有技术，这里还有更多患者等着我们。”陈守真说。

患者要么不来，一来多半是急危重症

就在不久前，喀什二院产科团队成功开展新疆第一例单孔腹腔镜下妊娠合并巨

大卵巢囊肿剥除术，这场手术的主刀者正是陈守真。

23岁的孕妇海女士突发剧烈腹痛，B超提示，其右侧附件区可见近15厘米的囊性包块。迎接新生儿的喜悦瞬间转为惊慌失措，年轻的准妈妈不由担心：“这个‘坏东西’会不会影响宝宝？”

“患者很年轻，虽然良性囊肿较大，但我们在做手术时会尽全力保留卵巢，以此保障患者的生活质量和今后的生育能力。”陈守真坦言，诸如单孔腹腔镜等微创手术在上海已经开展得比较普遍，但在当地，这类手术还很少涉及。在当地，要开展这类手术，不仅需要一名外科医生，更需要一个团队的配合。于是，在麻醉科团队的协助下，陈守真一边手术，一边带教，最终与喀什二院产科主任医师玛依拉一起顺利完成了这台手术。手术后，海女士恢复良好，医生定期给予保胎药物，母婴一切正常。

一名上海的妇科医生，到喀什要“掌舵”整个产科，陈守真坦言，起初心里没底很忐忑。“受限于当地的生活环境和经济条件，许多产妇的产检与保健意识没有完全培养起来，一些本来能够早发现、早治疗的小问题，一不小心会拖成‘大麻烦’。”抵达不久，陈守真就发现一个情况：患者要么不来医院，来的多半是急危重症。就在不久

前，他们刚接诊一名孕八周合并脑梗的孕妇。此外，先心病合并妊娠期高血压、妊娠合并血栓等危重症孕产妇也不少。

想办法送医上门，打通服务群众健康“最后一公里”

犹记得多年前，喀什地区的疑难危重患者只能去乌鲁木齐寻求救治，而今，喀什二院的名声在全疆远扬，甚至有北疆的患者慕名远道而来。得益于上海首创的医疗人才“组团式”支援，喀什二院在医院管理、科室建设、人才培养、信息化建设等方面的工作不断完善、提升。

就拿陈守真所在的产科来说，背靠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强大的技术后盾，沪疆两地的产科培训一直不间断，如今，医生们在此开展工作已得心应手。

尽管医院整体诊疗能力不断提升，但陈守真明白，这离打通服务当地群众健康需求的“最后一公里”还有距离，尤其是达成“三降一提高”（降低传染病发病率、降低孕产妇死亡率、降低新生儿死亡率、提高人均寿命期望值）的目标，还需要加把劲。

“‘三降一提高’中，有两项任务与产科息息相关，我们责任重大。”陈守真和队友们发现，当地患者健康观念、就医意识还有

待提高，“在这里当医生与上海不同，我们不能光坐在诊室里等患者来，我们得想办法送医上门。”每个季度，上海的援疆医疗队都会到喀什下属各县开展巡回医疗。帮助县级医院解决棘手难题，已成为队员们的常规工作。

来自莎车县的一位孕妇陈守真印象很深。这名32岁的孕妇患有风湿性心脏病，合并肺动脉高压，当时的情况十分危急。“按照诊疗原则，这种情况必须马上停止妊娠，否则危及孕妇产命。”陈守真记得，当时无论怎么做工作，孕妇很坚持，一定要生下孩子。

孩子要救，妈妈也要救！围绕这名孕妇，上海援疆医疗队队员们走到了一起。中山医院内科医生、新华医院心外科医生、瑞金医院麻醉科医生、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新生儿科医生，会同陈守真一起进行多学科讨论治疗方案。终于，在这名孕妇产29周时，救治团队为她进行了剖宫产，母子平安。目前，新生儿正在喀什二院新生儿的暖箱里接受悉心照护，不日将回家与父母团聚。

“提升当地百姓的健康意识，提升危重孕产妇救治能力，一切依旧任重道远。”陈守真说，目前无创DNA产前检测已落地南疆。他计划在自己援疆的一年中，与当地医务人员携手建立起“产前诊断中心”，为更多准妈妈的优生优育保驾护航。



十多年来，依托上海30余家三级医院“组团式”援疆，一批又一批上海医生奔赴喀什，开展医疗帮扶工作。图为援疆医生陈守真(右)在进行手术。(受访者供图)



中秋国庆假期，上海南京路步行街游人如织。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上海公安机关在全市启动高等级社会面防控勤务，加强对大客流景点及其周边重点区域的安管理工作。图为黄浦公安分局交警在外滩指挥交通。本报记者 赵立荣 通讯员 乐凌浩摄

剧场剧目双上新，引来观剧“特种兵”

(上接第一版)瞄准了如此火热的票仓，上海更多新建剧院将目标定位在音乐剧领域。

比如位于黄浦江畔的西岸大剧院，也聚焦现象级音乐剧剧目的驻演。来自上海大剧院的运营团队从试水音乐剧《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文版开始，未来将出品更多大制作，以此服务西岸大剧院。“引进海外老牌经典音乐剧，推出IP改编音乐剧，这些都在推动中。”西岸大剧院副总经理叶飞告诉记者。

多语种+“含沪量”，引进剧目与原创剧目接连上演

不久前，记者在音乐剧《爱情神话》排练厅中看到跳探戈、踢踏舞、爵士舞的演员身影，听见音乐人彭飞为该剧创作融合多种风格的曲目，还有大量沪语对白与唱段，尽显海派文化的兼收并蓄。这部音乐剧根据邵艺辉导演的电影《爱情神话》剧本改编，10月初在临港演艺中心完成试演后，将于10月5日至8日在上海文化广场首轮演出6场，让本地和外地观众都能感受到浓浓的上海味道。

“我曾在伦敦西区的剧场里看过，很多音乐剧、舞台剧都源自我们看过的电影。那时候我就在想，等中国的电影上映后，能不能将其搬上舞台？在上海，这一切都将成为可能。”音乐剧《爱情神话》是导演徐峥监制的首部音乐剧，用他的话说，上海有成熟的剧场观众、成熟的专门演出音乐剧的剧场、成熟的音乐剧演员和成熟的制作团队，“所以当我们想把一部电影改编成音

乐剧时，可以马上组队让它实现”。

从“含沪量”很高的演员阵容，到剧目中大量使用的上海话对白和唱段，还有自行车接送、爷叔们扎堆、菜市场唠嗑等充满上海市井气息的场景，音乐剧《爱情神话》处处彰显上海文化，也是上海原创IP在舞台上大爆发的一个绝佳案例。正如该剧出品方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总裁马晨骋所说：“近年来，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推出的‘全沪语’舞台剧《繁花》系列大获成功，音乐剧《爱情神话》又是一部讲述上海故事的舞台作品，我们希望它能吸引全国观众来上海，在音乐剧的语言中听懂上海故事。”而依托“爆款IP+顶级团队+全新创制”的号召力，音乐剧《爱情神话》还计划前往各地，向全国观众传递上海的文化气息。

如果说《爱情神话》的编创过程体现了上海作为文化源头的蓬勃创造力，那么接下来的申城舞台将成为文化码头，迎来更多不同语种外语剧目的全面开花。其中既有英文原版音乐剧《泰坦尼克号》《过去五年》《音乐之声》《曾经》《玛蒂尔达》，也有俄语原版音乐剧《恶魔奥涅金》、法语原版音乐剧《唐璜》等外语语种音乐剧，将为沪上观众带来风格迥异的视听盛宴。

“在我看来，上海观众完全具有欣赏多语种音乐剧的审美能力。比如，我们在2014年和2016年相继引进德语音乐剧《伊丽莎白》《莫扎特II》，2018年引进西班牙语音乐剧《卡门·古巴》，都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费元洪介绍，上海文化广场多年来致力于引进多语种音乐剧，而呈现不同异域风情的音乐剧，在上海也总能找到喜爱它的观众。这正是——一座亚洲演艺之都开放包容的底色。

以古尔纳为例，被诺奖“发现”的作家对文学和现实有着怎样的意义？

■本报记者 柳青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揭晓时刻即将到来，过去几年里，接二连三的诺奖作家对中国出版界和读者而言都是陌生的新人。以2021年获奖的古尔纳为例，在得奖前，他的小说没有出版过中译本，除了一本收录非洲现当代短篇小说的集子收入了他的另一则小作品《博西》。学者罗岗在一次讲座里回忆，他对古尔纳这个名字最初印象来自一部文学评论集，当时他没见过古尔纳的任何小说，完全不知道这位作家。在过去的两年里，得奖后的古尔纳有10部作品被陆续译介，即便如此，他在大部分中国读者认知中仍是个“未知”“神秘”的作家，最近一期的思南读书会中，当作家赵松和译者魏立红提问现场是否有读者读过古尔纳的小说，无人举手。

围绕诺奖的高关注度，与读者接受“冷门”诺奖作家的缓慢迟疑，形成戏剧性的对照。那么，诺奖对作家的选择为何与大众背道而驰？这些诺奖推到公众视野中的作家，比如古尔纳，他们的“被发现”对文学、对现实有着怎样的意义？

文学奖的“用处”

诺贝尔文学奖的结果是带有偶然性的，与其计较它的权威性，倒不如说，它扩展了全世界读者对写作和作家的认知——这是许多作家、译者和评论家的共识。一位经验丰富的外国文学编辑总结，作家们越是商业化成功、公众知晓度高，就越是远离了诺奖，米兰·昆德拉是这样，村上春树也是。

作家赵松认为，虽然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会封闭又老龄化，很多时候授奖词几乎是陈词滥调，还在前些年曝出丑闻，但它依旧有忤逆主流、和大众背道而驰的勇气。最明显的表现是在2019年颁给饱受非议的汉德克，可见它在文学判断的层面是极为自信和强悍的。

有书评人和读书博主认为，频繁地选择冷门作家，这恰是彰显了文学奖的“用处”，它不断地给全世界的读者打开新的窗口，让人们了解多样化的文学样态和文学前沿的模样。阿列克谢耶维奇、托卡尔丘克、安妮·埃尔诺和古尔纳这些作家得奖，激发读者在阅读中重新认知文学何为，重新思考写作的使命。

关键词是“文学”

赵松分析古尔纳的写作特色时谈到，诺奖的选择不是为了平衡文学的地缘政治，这位非洲作家最吸引人的并不是他的族裔身份或写作题材，而是他无与伦比的叙事技法，他得奖是纯文学的选择。

古尔纳的第一部长篇《离别的记忆》是“成长小说”，技法却极为成熟。他写坦桑尼亚海边小镇的一个少年，陷在看不到希望的生活中，父亲家暴母亲，妹妹自甘堕落。作家用平静的语调写绝望的环境，他笔下没有愤怒，也回避男主角的内心世界，他用平淡的叙事铺陈无可救药的父亲，让人窒息的小镇，把一整个特殊的小世界展开在读者面前。从一开始，古尔纳的写作风格就很有辨识度，他用多声部、多层次的叙事，打开了丰富的叙事空间。他用多样化的叙事艺术讲同样的事，讲事件中被牵扯的不同人的不同状态交织。他不写任何大事

(上接第一版)

用于多种疾病防治，科学界对mRNA期待更多

那么，随着全球逐渐走出新冠疫情，是否意味着mRNA研究将就此打住？并非如此！多名科研人员昨天接受采访时表示，mRNA研究热有望进一步开启。

有研究人员称，mRNA技术路线的意义就在于，作为一种储备研究技术，它有助于帮助人类在面对突发传染病时快速制备出相应的疫苗。不止于传染病领域，有观点认为：“这些技术不仅彻底改变了疫苗学，更是蛋白质疗法的典范转移，未来还可应用于其他病毒疫苗、个性化精准癌症治疗、人类免疫缺陷，甚至罕见病等疾病领域。”

在全球，这一研究领域当属时下热门。“除了新冠、流感、艾滋、肿瘤等疾病领域，也试图利用这个技术路线开发相关预防性的疫苗，以及治疗用的创新药物。”应天雷告诉记者，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已有不少科研人员投入mRNA方向的研究。

就在今年9月，上海交通大学药学院教授章雪晴团队也相继报道了有关mRNA的两项研究工作。深耕靶向mRNA递送系统研究逾10年，章雪晴告诉记者，与当前mRNA技术研究领域的火热不同，她入行之初，整个mRNA研究领域尚处于“冷板凳”时期，一度不被看好。“因此，当得知mRNA疫苗快速

件，但是沉着地把读者拉入叙事空间的深处，体会一个个特定个体的生命经验如何慢慢展开。但他又擅长写得很疏离，就好像隔着贴着玻璃看一群人，近在眼前又触摸不到。

译者魏立红注意到，在古尔纳的小说里能感受到英语文学史的纵深。他的代表作之一《砾心》，是对莎士比亚剧作《一报还一报》的改写，在莎剧的框架里写1960年代一个东非家庭遭受当权者的戏弄分崩离析。他的小说中唯一以女性为主角的《多蒂》，很有野心和英国文学史形成互文，热爱阅读的女主角读到第一本重要的书是《大卫·科波菲尔》，因为她的非洲裔身份，她被嘲笑“看不懂狄更斯”，这个好强的女孩通过阅读狄更斯、奥斯汀和康拉德的文学作品来塑造自己。古尔纳曾说过，《多蒂》是他所有作品中互文性最强的一部，他用文学的方式呈现一个没有过去的人在文学中找到自我。

以写作对抗被简化的历史

古尔纳小说里的人物，大多是以往文学作品中官方历史中“看不见的人”。他在1980年代中期写出《多蒂》，女主角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英国黑人，通过这个18岁少女的视角，读者看到从一战到1960年代的半个世纪里，三代移民在英国无法扎根的飘零史。在古尔纳写这部作品时，几乎没人写发生在英国本土的黑人的故事。以及，在同时期非洲作家的作品里，女性尤其穆斯林女性的形象，几乎是缺失的，没有多蒂这样有极强自主意识、主动构建个体身份的现代女性。

多蒂出场时，是一个风尘女的女儿，不知道父亲是谁，母亲也不愿告诉

女儿有关她的家庭和上一辈由来的故事。多蒂在英国出生、长大，但因为肤色，她被开除“英国人”的身份，永远被视为异邦人和外来客。多蒂不断地通过身边知情人的回忆口述，钩沉了一段私人的家族史：一战时期西印度群岛的贫民怎样被充入军队又被带到英国的港口，那些一无所有的黑皮肤的人们怎样在伦敦的诺丁山形成移民社区，白人流氓怎样摧毁了黑人在诺丁山的栖息地，在英国街头沉沦的黑人移民后代怎样怀揣着梦想奔赴美国又最终梦碎哈德逊河畔。读者和多蒂一起“发现”了这段20世纪上半叶殖民统治下，跨越了非洲、欧洲和美洲的底层迁徙的历史，这些在口述中代际转移的生命经验，在西方国家史中是被忽略的。古尔纳创造了多蒂，她就像一个耐心的向导，带着一无所知的人们深入了不被书写的历史的密林中。

这是古尔纳进入诺奖视野很重要的原因，他的写作抵抗着被简化的历史。他反复写微不足道的人们，写家庭故事里的耻辱和秘密：多蒂的外公逃离离开阿富汗，母亲沦落风尘，弟弟横死于纽约；《砾心》塞利姆的母亲为了救护家人而委身于当权者，后续为家庭平安和儿女出路，持续与对方苟且，父亲无力反抗，在长久的隐忍后出走……那些苟活下来的弱者，在古尔纳的作品里拥有了形象和声音。这些“窝囊人”是被边缘化的，但他们同样拥有梦想，有鲜活的灵魂。古尔纳揭示了作为弱者的一生，并不只有痛苦和挣扎，他们因为对身边人的倾听和重新认知，达成灵魂之间的包容共鸣，这是“成功者叙事”看不到的普通人的自我拯救——无法改变现实的弱者，至少夺回了讲述的权利。

因新冠疫苗一战成名，mRNA研究热还将持续

研发奠定基础的两位科学家斩获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时，我们作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也倍感振奋。”据章雪晴介绍，眼下，以mRNA为代表的核酸生物技术在更广泛的疾病治疗领域被寄予厚望。不过，核酸药物作为一种外源药物，其进入人体内发挥作用还需要克服重重阻碍，包括不稳定性、免疫原性、靶向效率差、内溶体/溶酶体逃逸难、转染效率低等，这些都是该领域的研发核心。

复印机旁的友谊，成就“冷板凳”迎来聚光灯的传奇

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背后也包裹着一个励志的故事，两位获奖者的科研人生被反复提及。尤其是考里科，她对mRNA进行了持续40年左右的研究，曾一度被科学界认为是“走在一个无聊的死胡同里”。

考里科1955年出生在匈牙利的东部小镇，1972年考入塞格德大学，这是匈牙利最著名的大学之一。1985年，她与丈夫及2岁的女儿从匈牙利搬到美国。然而，等待她的是——一条无法坎坷的学术道路。1990年，考里科第一次为mRNA项目申请科研经费，结果被拒。1995年，由于她接连申请不到科研基金，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要将她“扫地出门”。与此同时，她还被诊断出患有癌症。最

后，她不得不接受宾夕法尼亚大学对她降职、降薪的要求，这才得以留任。

直到1997年，考里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的公共复印机旁，遇到了刚加入医学院的新教员，38岁的韦斯曼。韦斯曼1959年出生在美国，他的大部分研究经历投入传染病领域，尤其对艾滋和流感这两种传染病感兴趣。两人开始攀谈并介绍自己的研究，复印机旁的友谊成就了一段佳话：彼此成为对方最重要的科研伙伴。两人由此开启的合作之路，将考里科又一次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因为，如果没有科研经费以及实验室的接纳，考里科可能再次面临“扫地出门”的危机。2005年，两位科学家发现通过修改RNA基因序列中的单个碱基，可以防止其不会产生炎症，这一重要成果发表在知名学术期刊《免疫学》上，对推动mRNA应用产生了里程碑意义。

然而，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两人依然籍籍无名。直到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全球暴发，mRNA疫苗横空出世，这对科研伙伴也从幕后走向台前，“冷板凳”迎来聚光灯。

“到底哪些研究是重要的，我们没办法由当下的结果来推导。科学世界固然充满着偶然、意外，但专注科学探索的过程、追逐好奇心的兴趣、孜孜以求的投入等科学精神，始终令人敬佩，值得学习。”一名科研人员谈及本年度诺奖首个揭晓奖项时，这样对记者说。